



王充及其論衡

田昌五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王充及其論衡

田 昌 五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王充及其論衡

田 昌 五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商標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 6 · 插頁 1 · 字數107,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5,001—55,000 定價 (7.0) 55元

統一書號 2002·109

校對者：左燕君等

前 言

讀了王充的著作，我認為有對之加以總結的必要。這，一方面是想評價王充及其思想，另一方面是感到王充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

王充是漢代反動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的“叛逆”，這就是他的偉大處。因此，他的一生備受壓抑，他的學說也不見重於世。在他死後，歷代的反動封建學者都對他橫施污蔑和攻擊。有的說漢代“文章”甚盛，但王充的著作却是由盛而衰的產物。有的說他的著作蕪雜而不精，不足為訓。有的甚至發為“誅心”之論，說他“詆訾孔子”，“厚辱其先”，乃“名教之罪人”，其著作自無可取之處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個別進步的資產階級學者曾經注意到王充的無神論思想，並利用它來反對封建迷信，但對王充的思想缺乏全面的研究。解放前，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曾經給予王充的思想以應有的重視，並試圖對王充的思想作出全面的評價，不過也沒有完全如願以償。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中國人民早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翻了身，掌握了政權。我們也應該數千年來受盡壓抑的王充翻過身來，並對他的學說給以科學的總結，恢復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應有的地位。

王充對漢代正統的反動思想體系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批判。這個反動思想體系的基本特徵就在於其神學性和宗法性。它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等揉合在一起，作為反動統治

階級的思想支柱。这种反动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地占有支配地位。毛澤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談到旧中国的傳統的統治权力时，曾經提到“神权”、“政权”、“族权”、“夫权”^①。这几种权力压在农民身上几千年。它們在思想上的表現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天地君亲师”。随着中国两次大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反动思想也隨之土崩瓦解了。但，正象反动統治階級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样，反动的思想体系也是不会自动消亡的。而且在反动統治階級被打倒之后，其思想殘余还往往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肯定地說，上述反动思想的殘余今天依然还有的，并阻碍着我們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我們必須不断地清除这种旧社会留下来的思想垃圾，直到它完全消灭为止。总结王充的思想，将有助于我們清除这些反动思想的殘余。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如何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鮮明的战斗性在总结中有机地結合起来呢？对此，毛澤东同志早已給我們作了原則性的指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②。我們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如何把它具体地貫徹在我們的总结中，仍是不无問題的。因为即使是古代最进步的思想家，他的学說也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杂揉在一起的。要想在剔除糟粕时保留精华、在吸取精华时揚去糟粕，确非易事。以王充为例，他的思想中就是唯物主义和自然宿命論糾結在一起。其中有的論点一方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具有唯心主义的因素。有的是唯物主义包着唯心

① “毛澤东选集”，第1卷，1951年第1版，第33—34頁。

② 同上書，第2卷，第679頁。

主义,或者相反。有的問題作者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的,但結果却岔上了唯心主义的路子。而且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东西,在現在看来也許还有問題。反之,即使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当时也可能有些积极意义。总之,情况是复杂的,这里不过是几个例子罢了。对这一切,必須遵照列宁的指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①。我們的总结應該是这些經過具体分析的具體材料的綜合。在“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②的过程中,一方面应根据历史主义评价其得失,同时也要按照現代的科学水平指出其缺陷;一方面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将其阶级性充分显示出来,同时也要指出其阶级的局限性;从而把它固有的科学性与战斗性和我們的总结所应有的科学性与战斗性有机地結合起来。

必須說明,个人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要完成这一任务,自然格外困难。文中錯誤当所难免,尙望专家們和 同志們慨然教正。

本文写成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最后修改时曾参 看了一些有关的近人著作。其間見仁見智,互有异同。不敢掠美,附此声明。

在本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曾得到一些朋友的帮助与鼓励,特别是三联書店編輯部的同志們对我帮助 很大。在此一并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田 昌 五

一九五八、一、八于北京

① 列宁:“共产主义”,轉引自“毛澤东选集”,第3卷,1952年第1版,第778頁。

② “毛澤东选集”,第3卷,1953年第1版,第820頁。

目 次

前言

一 王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1
二 唯物主义的自然觀·····	27
三 战斗的无神論·····	68
四 社会历史觀·····	98
五 唯物主义的認識論·····	119
六 对先秦諸子和各种書傳的批判·····	135
七 余論·····	153

一、王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王充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偉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一位大无畏的斗争的无神論者。他的著作流傳到現在的只有一部——“論衡”。这是他的一部最富于战斗性的代表作，是他差不多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的。这部著作以論战的形式对当时占統治地位的神秘主义的和复古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統的批判，建立了和它正相反对的以“异端”形式出現的思想体系。王充的“論衡”今天仍然是一部膾炙人口的著作。王充所作的批判工作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滅的现实意义。

要了解王充和他的“論衡”，我們首先必須弄清楚他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从而找出王充的思想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王充是东汉时代人，生活在这个朝代的前半叶，差不多經歷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朝。“論衡”的末尾有一篇王充的自傳，題为“自紀篇”。它是我們了解王充的生平的重要依据。他在其中自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建武三年，充生”。建武是东汉光武（刘秀）的年号，建武三年相当公元二十七年。距現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王充的卒年較难考訂，但也并非毫无脉絡可寻。他自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阳、九江、廬江。后入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这是王充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仕进，时在章帝元和三年到章和二年，即公元八十六——八十八年，王充这时約六十

二岁。关于他的这次仕进，“后汉书”“王充传”有类似的记载，唯年代不詳。“王充传”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轉治中，自免还家”。据此，王充自紀中的說法是可信的。在致仕之后，王充就在家中养老，一直到死。不过在死之前，他还写过一部“养性之書”。“后汉书”“王充传”称他“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書十六篇”。这部書究在何年著成，“王充传”中沒有說明。幸好他在“自紀篇”中給我們提供了一点綫索。他自称：“庚辛域际，虽惧終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書，凡十六篇”。这就是說，該書成于“庚辛”之际。“庚辛”之际究竟在那一年是不难推算出来的。王充生那一年是丁亥年，后推六十二年到他致仕那年是戊子年，再后推二——三年就是庚寅年和辛卯年。王充这部書必在这两年中著成无疑。这时他已六十五岁了。“王充传”說他“年漸七十”，尙称可信。王充究竟在那一年死的，找不到确切的材料。“王充传”称他“永元中，病卒于家”。永元是东汉和帝的年号，共十六年。上边提到的“庚辛”之际是永元二、三年，即永元初年。既然永元初年王充还在著書，他之死必定在書成之后，因此，“王充传”的記載，还算可靠。那么，王充大概是卒于永元之八、九年了。我們姑确定王充卒于永元九年，即書成后之第六年。这一年是公元九十七年，王充七十一岁卒，距現在正好一千八百六十一年。

王充究竟代表那个阶级，各家的說法不一。有人認為他代表中小封建主，也有人認為他代表农民。我認為王充代表中小所有者，而接近于农民。他的家世和經歷可以說明这一点。王充在“自紀篇”中叙述其家世如下：

“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几世尝从軍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絕，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

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讎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讎所擒，祖父汎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塘县，以賈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钱塘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这段坦率的自白很重要。它说明王充的先世不是豪门大族，而是受地方豪族压迫的；他的先世虽一度受封，但后来就日趋沒落了。不过我们也绝不能把王充的先世视为一般的农民，因为他的祖上曾经为官，失官之后还有钱买土地，再后还有钱经商，而且能供王充读书。王充的先世的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就决定了它敢于、而且不得不和豪族对抗。有人认为王充先世的反豪族的传统仅仅是一种“墨侠”或“游侠”的传统，是不够恰当的。当然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估计到“墨侠”或“游侠”传统的社会影响，固无不可。

我们不妨具体分析一下王充的家庭历史。他的祖先曾因军功受封，无疑即得到过军功爵。军功爵是秦制，共二十级。汉因秦制，没有更改。按照这种制度，凡是为国家立下战功的人，都可以受到特殊的赏赐，上者为王侯，下者也可以得到免役免税的优待。王充的祖先曾因军功受封过一亭之地，汉制“大率十里为亭，亭有长”，也就是说他的祖先曾享有一亭之地的国家租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封爵呢？我们引几则汉高帝（刘邦）分封功臣的材料即可明白。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汉书高纪》）

“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同上）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从軍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詔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謂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輕也，吏独安敢取此！”
(同上)

据这几則材料来推断，王充的祖先所受的封爵既非“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也不仅是“复其身及戶”或“世世复”，而乃是介于二者之間的“下乃食邑”。其爵級当在五級至九級之間，很可能是八、九級爵，即公乘或五大夫之类。这种爵虽然相对地說是“高爵”，但实际并不高，因此才有“甚多高爵”的現象。有这种爵位的人勉强可以“食邑”，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起不了甚么大作用，最多只能在地方上和“令丞亢礼”一下，如此而已。也許王充家中的任俠傳統就是受了其祖上的这种武功的影响。

王充的祖上究竟在何时受封、何时“国除”的，我們不得而知。据估計其受封可能在西汉中叶的武、宣之际，而其“国除”当在西汉后叶，其間時間不会太长。因为起碼在他曾祖父时，王充家已弃官为农，即“以农桑为业”了。而他祖父的迁居是在“会世扰乱”之际，当系新莽前后。随着王充祖上的弃官为农，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經濟地位必然随之下降，而受到了地方豪族的侵凌。我們看他祖上迁居的原因，第二次是由于和“豪家”結了仇，第一次是由于“恐为怨讎所擒”。这种“怨讎”絕非一般的老百姓，而应是地方豪族。因为象这种曾經立过軍功、并和“令丞亢礼”的后裔，除了地方豪族，一般老百姓那敢欺侮他們呢？

随着第一次迁居，王充家里进一步衰败下来。这表现在

他祖父的弃农从商上面。也就是說，在豪族的侵逼下，王充的祖父喪失了自己的土地，轉而經營小商業了。因此，他稱自己的祖父“檐載”而逃，當不是太誇張的說法。但是在第一次遷居之後，他家並沒找到一片安樂的地方。在錢塘縣，他家又受到豪族的欺凌，而且和“豪家丁伯”結了仇。結果，他父親被迫再次遷居，逃到了上虞縣。

在逃到上虞縣後，他家可能繼續經營小商業。但是隨着第二次遷居，家道一定更不如以前了。因此王充雖能勉強讀書，並到京師洛陽游學，但由於家貧買不起書，他在洛陽時不得不到書市中站着看書。“後漢書”“王充傳”說他“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可見，王充所以能成為當代的大學者，不僅是因為他有天才，而更重要的是由苦學而成的。

綜上所述，王充的家庭出身的确是象他自己所說的“細族孤門”（“自紀篇”），“細族”當然是對豪族而言，“孤門”就是說沒有什麼族黨可以凭借。所以我們說，王充出身於中小所有者的家庭，它是日趨沒落的，受壓迫的；而且他家有反抗壓迫的傳統“任俠”精神。這一切不能不對王充的性格產生深刻的影響。

的確，王充是繼承了這種反壓迫的叛逆精神的。因此，他雖然學識淵博，是當時思想界的名流人物，却一生不得行其志。

據王充自稱，他自幼很聰明，六歲開始讀書識字，八歲到書館讀書，品德和學習成績一直都很好。因此，他後來被保送到京師太學深造，“師事扶風班彪”（“後漢書”“王充傳”）。但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節，而是博覽強記，精通“眾流

百家之言”。也許正是这种学习精神和自己的学术見解与班彪不合，所以他很快就离开班彪，独立地进行研究了。游学洛阳对王充之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巨人，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可是好景不常，王充不久就由洛阳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为什么王充不能长期留在洛阳进行研究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困难。

王充一生中也作过几次小官，但都系幕僚性質，没有什么实权，并且往往因意見不被采納而自动去职，所以每次仕进都为时很短。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著書立說，“屏居教授”。他自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自紀篇”）

他的职位最高的是“入州，为从事”，“轉治中”，最低的是为县府小吏，一般都是清閑的差事。“掾”是普通的政府随員，职务不定。“功曹”大概是考核政績的官。“从事”不过是协助刺史进行一些視察罢了。但是王充做事却并不馬虎，而当他的意見不見用的时候，他宁可弃官回家。例如章帝建初年間他在郡中做官时，因为发生了天灾，他就建議郡守下令“禁民酒”、“禁奢侈”（“对作篇”），結果都不見用。也許就是因为这个原故，他就自动辞职了。“后汉書”“王充傳”称：

“仕郡为功曹，以数諫爭，不合，去”。

他在州中做官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他自称为了作監察工作，不得不把研究學問的事攔在一边，說是“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寢廢”（“自紀篇”）。不言而喻，王充这样努力去“刺割”定会触怒不少权貴人物，因而必然受到打击和排斥，不得不“自免还家”。

由此可見，王充所以終身仕路不通，不僅是由于他出身寒門，無所凭借；而且是由于他的孤耿的不同流合污的性格，他的不避權貴的精神以及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被壓迫者的要求。但是，他的遭遇並沒有得到社會輿論的同情。相反地，他却因此受到了種種嘲笑與冷遇。有些在他作官時追隨過他的趨炎附勢之徒這時都叛離了他。更有些人污蔑他是無材和低能，玩忽職守等等。他在“自紀篇”中很沉痛地說道：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眾人蟻附；廢退旁居，故舊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弓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于事，力未盡于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于身？眾多欲以何趨乎？”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王充並不把這一切放在心。上。他不計較個人的窮通利達，而銳意于追求真理，廣泛地閱讀各種著作，並埋頭著述。這種酷愛真理的精神一直貫穿着王充的一生。他很自豪地說：

“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于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自紀篇”）。

但是，王充的著述活動照樣受到社會輿論的非難。人們聲稱，他既非出身于書香門第，又沒投靠名師，所以就不配著書立說。因此，他的學說一出世，就被視為異端邪說、被當作妖怪。反動統治階級一開始就想撲滅它。這樣，王充除了受到

生活的压迫外,还要受到精神的压迫。如果没有献身真理的决心和毅力,他压根就是无法进行著述活动的。请看王充所受的精神压迫吧!

“充細族孤門。或嘲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遺,虽著鴻麗之論,无所稟阶,終不为高。夫气无漸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賢?”(同上)

王充晚年的生活更为慘澹,作官早已是此路不通了,他根本也断絕了这个念头;教書和著述活动恐怕也因年老而无法繼續下去了,只有呆在家中默默地等待死神的降临。然而当时的社会却不許王充有一个愉快的晚年。因为年老沒有依靠,他連生活都发生問題了。所以,当他回顧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当他提到他的晚年生活的时候,不能不流露出无限的悲憤。他說:

“年漸七十,时可悬輿;仕路隔絕,志穷无如;事有然否,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遒迈;儔倫弥索,鮮所恃賴;貧无供养,志不娛快”。(“自紀篇”)

綜上所述,王充在一生中虽作过几次无关紧要的官职,但并没有落到統治集团里去,要这样也不可能。他的一生是一个貧困的知識分子的一生,是始終失意的一生,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备受打击的一生。这种遭遇不能不在王充的思想打上深刻的烙印。

但是,家庭出身和个人遭遇虽能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一个人的思想却不是完全地、并且主要地不是由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遭遇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經

济的发展和社会思想的发展。同时,家庭和个人就是社会的一个細胞,它的发展必然受社会政治經濟的发展所制約、所規定。現在,我們就来简单地追溯一下汉代社会政治經濟的发展和思想的发展,先說前者。

在西汉前半叶,小农經濟在数量上占有压倒的优势,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公社日趋瓦解的必然現象。汉初的統治者有鑑于以陈胜、吳广为首的农民起义和历年的战争破坏,实行了維持现状、“予民休息”的政策,对外特别是对匈奴甚至不惜以退让保持睦邻关系,对内則設法減輕人民的負担,并放任地方势力的发展。这种政策是明智的,它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内外战争,保持了帝国的表面上的統一,促进了社会經濟的恢复与发展,因而就出现了所謂“文景之治”的太平景象。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里只引証一則最常見者为証:

“至今上(按即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間,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財、京师之錢累巨万,貫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敗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攘而不得聚会。守閭閻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絀耻辱焉。当此之时,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宝廬輿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記”“平准書”)

社会經濟的发展为帝国的强盛提供了物質基础。在汉初,帝国是統一的,但却不巩固。在国内,地方势力威胁着中央政权,而且随着社会經濟的发展,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間

的矛盾更加尖銳了，地方勢力的离心傾向更加增長了。在國外，匈奴時刻在窺伺帝國的版圖，並從西北包圍了帝國的統治中心——關中。這時，帝國就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改變過去的內外政策，進一步鞏固中央政權和國家的統一。於是漢武帝就應運而生了。

為了鞏固帝國的統一和中央集權，漢武帝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對內政策方面，他吸取了漢初對地方勢力作鬥爭的經驗，主動打擊地方勢力。重要者如（一）繼景帝削平吳楚七國之後，進一步瓜分地方王國，並把地方王國徹底地置於中央政權控制之下；（二）繼高帝遷六國貴族於關中的強本弱枝政策，把地方豪強和資產三百萬以上的人遷於茂陵（按即武帝陵墓）；（三）任用酷吏，誅鋤地方豪強；（四）壟斷鹽鐵等貿易，打擊富商大賈；等等。在對外政策方面，他一改過去的忍辱退讓態度，而積極向外擴張。首先，他發動全國的力量打擊匈奴的侵略勢力，把它趕到漠北；其次，在驅逐匈奴的同時，他派使臣溝通了西域和帝國的關係，繼而把西域歸入版圖；其他如南侵南越、東并朝鮮以及開辟西南夷等，不一而足。這樣，帝國的版圖有了空前的擴大，並形成了空前統一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

漢武帝這些內外政策在客觀上有利於當時的社會發展，有利於中小所有者。同時，他也繼續執行了漢初以來的扶持中小所有者的政策，利用他們作為帝國的統治基礎。這些政策直到宣帝時代大體沒有變更。如前所述，我們估計王充祖上的受封是在武、宣時代。這就正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

但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勢力的矛盾只是當時的社會矛盾的一個次要方面，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和統治階級的